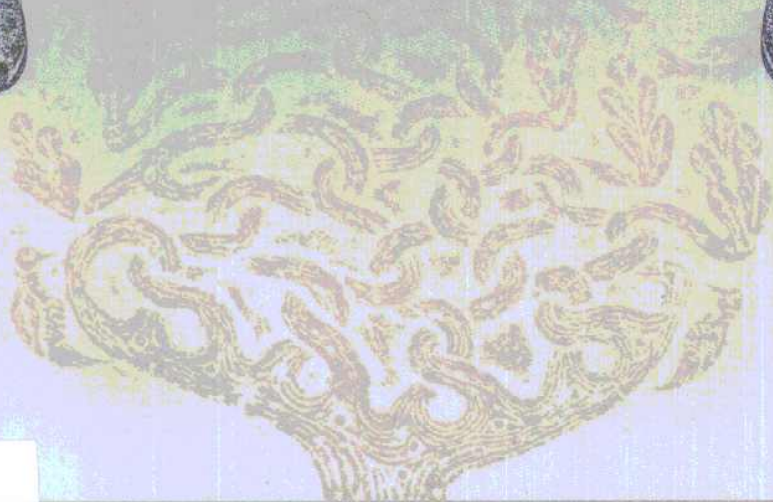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东汉三国时期 的 谈论

刘季高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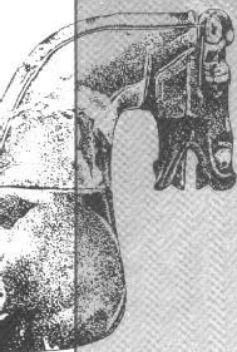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东汉三国时期 的 谈论

刘季高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

刘季高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2 字数 110,000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

ISBN7-5325-2617-8

I·1323 定价:10.10 元

引 论

本书撰写的目的,是把沉埋了一千七百余年的东汉、三国时期的“谈论”给发掘出来。

一、“谈论”的确实存在

魏晋的“清谈”(清言),人所共知,而东汉的“谈论”(“论议”),则似乎从未有人道及。

清谈是逃避现实的,而“谈论”则是进入现实的。东汉中期以后,一般从事“谈论”的名士,以当时的标准来讲,大都有高尚的人格,广博的学问,杰出的才能,并且是或多或少地关心人民的疾苦的。他们可以不怕报复,不计安危,与当时祸国殃民的宦官们斗,虽破家亡身,亦在所不顾,如李膺、张俭等。他们在黄巾起义的影响下,甚至想废掉荒唐已极的汉帝,另建新朝,如阎忠、张玄等。他们不疲倦地奖拔后进,作育人才,如荀淑、郭泰、许劭等。他们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”,如张纘、诸葛亮等。他们可以“运筹帟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,如荀彧、郭嘉、周瑜等。他们可以对山川形胜、边塞道路,了如指掌,如张纘、田畴等。他们可以不应征聘,功成不受

赏，视爵禄如敝屣，如申屠蟠、庞公、田畴等。他们可以一口气分门列举乡土古今名贤数十人，一一加以精当的品题，如虞翻、朱育等。他们可以舞刀抡矛，走及奔马，如沈友、虞翻等。

“清谈”对当代的政治，起了极坏的消极影响^①。其惟一可称述之处，是在语言方面，进一步对散文及诗歌作了有益的贡献。而“谈论”则自东汉中期迄魏末（一世纪末——三世纪中叶），一百五六十年的长时间内，对中国的经学、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政略、兵谋，都起了不同程度的阐发及推进作用。而对于文学的影响，仅仅是其余事。但就文学而言，却是划时代的影响。

然而一千七百多年来，人们只知道“清谈”。而对于“谈论”，不但不知道它的内容，连它的名称，似乎也很陌生。原因何在？无从深究。现在要从长期沉埋中，把它发掘出来，则首先得确定它的存在，这就需要请历史作证明。

（一）《后汉书》卷九八《郭泰传》*：

博通坟籍，善谈论，美音制。

（二）《后汉书》卷九八《谢甄传》：

与陈留边让善谈论，俱有盛名，每共候林宗，未尝不连日达夜。

（三）《后汉书》卷八三《申屠蟠传》：

博贯五经，兼明图纬。……太尉黄琼卒，……四方名

* 本书所引《后汉书》，系清武英殿本。该本“列传”置于三十卷“志”之后，因此每卷列传的序数，较之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，要多出三十卷。如“卷九八《郭泰传》”，标点本为“卷六八”。其余以此类推。

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，互相**谈论**，莫有及蟠者。

(四) 陈寿《益部耆旧传》：

董扶……发辞抗**论**，益部少双，故号曰致止。言人莫能当，所至而**谈止**也^②。

(五) 《襄阳记》：

习祯有风流，善**谈论**，名亚庞统，而在马良之右^③。

(六) 《蜀志》卷十《刘琰传》：

鲁国人也。先主在豫州，辟为从事。……有风流，善**谈论**。

(七) 《吴志》：

李肃善**论议**，臧否得中，甄奇录异，荐述后进，题目品藻，曲有条贯^④。

(八) 《荀粲传》：

诸兄并以儒术**论议**，而粲独好言道^⑤。

(九) 《魏志》卷廿一《应璩传》：

子贞少以才闻，能**谈论**。

谈论而至于“连日达夜”，决非一般闲谈或聊天。人数多至“六七千人，互相‘谈论’，莫有及蟠者”，“发辞抗论，益部少双”。必其“谈论”之内容——材料、识见及形式——辞藻、音节、气势，有大过人者，这才会“人莫能当”，“所至而谈止”。以此可推定：“谈论”是专名而非泛称。

“臧否人物”，给以“题目品藻”，及有关儒术的研讨，正是“谈论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此可推定：“论议”是“谈论”的别称。

总上九例及推断，证明“谈论”确实存在于汉魏时期，无可怀疑之处，完全可以把它肯定下来。

二、“谈论”的发生和发展过程

“谈论”起于何时？它是突然产生，还是由什么转化而来？

天下无任何突然产生之事物，“谈论”大致是由儒家各学派之间的“论难”转化而来。到底起于何时，亦得由史料来解答，不能随便乱猜或假定。

（一）儒家的“论难”，可以上推到战国时期的孟轲，一部《孟子》，几乎全是孟轲和人辩论的记录。

（二）卫宏《诏定古文官书序》：

秦既焚书，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。而诸生到者拜为郎，前后七百人。乃密令冬种瓜于骊谷中温处。瓜实成，诏博士诸生说之，人人不同。乃命就视之，为伏机。诸生贤儒皆至焉，方相难不决。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，皆压，终乃无声^⑥。

这一条故事性很强，既批判了秦皇，也挖苦了儒生的好“论难”。

（三）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九上《戴凭传》：

习京氏易，……正旦朝贺。……（光武）帝令群臣能说经者，更相难诘，义有不通，辄夺其席以益通者。凭遂重坐五十余席。

（四）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九下《张玄传》：

少习颜氏春秋，兼通数家学，……迁陈仓县丞。……时右扶风琅邪徐业……闻玄诸生，试引见之，与语，大惊，遂请上堂，难问极日。

(五)《后汉书》卷五五《鲁丕传》:

为当世名儒。……永元二年,迁东郡太守,……数荐达幽隐名士。

《续汉书》:

荐王龚等^⑦。

《后汉书》卷八三《王龚传》:

……迁汝南太守,……好才爱士,引进郡人黄宪、陈蕃(袁闾)等。……龚深疾宦官专权,志在匡正。

永元十一年,……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,(鲁)丕与侍中贾逵、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,帝善丕说。……丕因上疏曰:臣闻说经者,传先师之言,非从己出,不得相让,相让则道不明,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。难者必明其据,说者务立其义,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。……览诗人之旨意,察雅颂之终始,明舜、禹、皋陶之相戒,显周公、箕子之所陈,观乎人文,化成天下。陛下既广纳睿谟,以开四聪,无令刍蕘以言得罪。

从上述前四条来看,儒家各学派之间的“论难”,可谓源远流长,大较言之,可分为二种:一种是私人之间,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论难。一种是在朝堂上,当着帝王的面,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“论难”,或者由帝王召集的有数十人参加的规模较大的“论难”会。这两种“论难”,当然是前一种多而普遍^⑧,后一种少而特殊。但其影响,则后一种较大。尤其是光武帝所出的新花样,把“论难”变成竞技的性质,“论难”之优胜者,可以获得名誉及地位。这必然会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一种影响,使“论难”有从内容到形式获得进一步发展或转化的可能。

第五条鲁丕“荐王龚”,王龚又“引进郡人黄宪、陈蕃、袁闾

等”。“龚深疾宦官，志在匡正”云云。黄、袁并是当时从事“谈论”的名士。陈本身是名士，后来由于他的地位，又是名士们的“护法”，而“深疾宦官”，又是当时从事“谈论”的名士们思想上的共同点。从中可以看出名儒与名士之间，“论难”与“谈论”之间，在人事关系及思想倾向上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。

鲁丕的奏章，有几点值得注意：

(一) 把为什么要“论难”，怎样进行“论难”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^⑨。

(二) 从专门说经，逐步走向对国政有所论列，在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下，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。

(三) “浮华”(或作“浮丽”)一词，在这里似乎是首次出现^⑩，在同书里，另外还在几处地方出现：

《后汉书》卷六二《樊准传》：

邓太后临朝，儒学陵替。准乃上疏曰：……今学者益少，远方尤甚。博士倚席不讲，儒者竞论浮丽，忘眷眷之忠，习谄谄之辞。

《后汉书》卷五《安帝纪》：

延光元年(122)，诏……举……清白爱利……有益于人者。……刺史举所部，郡国太守相举墨绶^⑪，……勿取浮华。

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九上《儒林列传》：

本初元年(146)，梁太后诏曰：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学。……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。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

《后汉书》卷一〇〇《孔融传》：

……郗虑承望风旨，以微法奏免融官。……操致书

激厉融曰：……又知二君，群小所构。孤为人臣，进不能风化海内，退不能建德和人；然抚养战士，杀身为国，破浮华交会之徒，计有余矣。

在《鲁丕传》、《樊准传》、《安帝纪》、《儒林列传》里出现的“浮华”一词，似乎不是一般的贬词，而是实有所指。指的是什么？在上列各该条里，都很难找到解答。幸而《孔融传》里有其指斥的对象。曹操那封信的结尾处，是指桑骂槐的威胁性语言。所以这里的“浮华”指的是什么？可以从孔融身上获得解答。

孔融为汉末的大名士，是人所共知的。汉末的名士，是很少不能“谈论”的。也可以说，因为能“谈论”，才够得上做名士，孔融当然不会例外。

《续汉书》：

融……与平原陶丘洪、陈留边让，并以俊秀，为后进冠盖。融持论经理，不及让等，而逸才宏博过之^⑩。

《九州春秋》：

……及高谈教令，盈溢官曹，辞气温雅，可玩而诵。……自春至夏，城小寇众，流矢雨集，然融凭几安坐，读书论议自若^⑪。

“持论经理，不及让等，而逸才宏博过之”，是说孔融的“谈论”，条理性稍差，但内容丰富；“辞气温雅，可玩而诵”，是对他的“谈论”所使用的语言和气度的赞美；“城小寇众，流矢雨集，然融凭几安坐，读书‘论议’自若”，当死生呼吸之际，还照旧“谈论”，是孔融不但是名士也是谈士的最好说明。据此，曹操与孔融书里所谓的“浮华”，指的应该是“谈论”。“浮华交会之徒”，化作口语，即一伙成群结党的谈士。表面是指斥挑拨孔

郗二人关系的“群小”，实际骂的是孔融一伙谈士。这么一来，《鲁丕传》、《樊准传》、《安帝纪》、《儒林列传》里的“浮华”或“浮丽”，指的是什么，均可迎刃而解，指的是“谈论”（“论议”）无疑了。“浮华”一词，既得到明确的解释，前面所引的几条史料，就都能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了。

“浮华无用之言，不陈于前”。鲁丕站在当时正统儒生的立场，诋“谈论”为“浮华无用”，可勿予置理。要在他说明了一个一直被埋没了的重要历史事实——最迟在汉和帝时期（89—105），或者还要早一些，“论难”已部分转化为“谈论”，或“谈论”已从“论难”里面派生出来了。

“博士倚席不讲”，因为他们所讲的，人家已不要听。“儒者竞论浮丽”，儒生们抢着从事于“谈论”。“习谄谄之辞”，谄谄，巧言也。儒生们不但抢着从事于“谈论”，而且要求谈得动人听闻。这在当时樊准一派看来，便是不忠于汉王室的行为。樊准的这道奏疏，是邓太后临朝后所上（邓后于和帝元兴元年临朝），说的正是和帝时（最少是末年）已然的情况，而不是邓后临朝后才发生的情况。樊准的奏疏上距前条鲁丕的奏疏（永元十一年），最多不过七八年的时间，似乎“谈论”已不再是处于初步转化阶段，而是进一步发展了。

安帝是和帝的承嗣子，他做了十九年皇帝（107—125）。其实前十四年，是他的承嗣母邓太后在做；后五年，才真是他做。延光元年（122），便是他亲政的第二年。“浮华”一词，由臣僚的奏疏，进入帝王的诏书，不惜以不予提升来相压制，说明这时“谈论”之风已进展到使统治者害怕的地步。《儒林列传》说：在安帝时期，太学“学舍颓敝，鞠为园蔬，牧儿莠竖，至于薪刈其下”。可能是由于他厌恶“浮华”，迁怒太学所致。他

的被他废黜过的太子,后来在宦官帮助下,才能继承帝位的顺帝(126—144),却反其道而行之,“乃更修黄宇”,并“开拓房屋”,“凡所造构,二百四十房、千八百五十室”^④。不管他是因为听了大臣的劝告,还是对他父亲不满的一种发泄,总之,他做了一件有益的事——给“谈论”提供了进一步开展的场所。

质帝本初元年(146),是梁太后临朝的第三年,上距邓太后临朝以前的和帝时期(89—105),已是半个世纪左右。也就是“谈论”已存在了将近五十年或五十年以上,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。太学的房舍扩展,太学生的人数增至三万以上,这就为谈论之风的扩大,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。“多以浮华相尚”,说明“谈论”并没有被政治压力压下去,而是蔚成风气了。

上引四条史料——《后汉书·鲁丕传》、《樊准传》、《安帝纪》、《儒林列传》——确凿地说明了“谈论”的发展过程。现在要探查一下“谈论”的内容是些什么了。而要探查它的内容,还得先探讨一下它所以发生发展的原因,及时代背景所给予它的影响。

三、“谈论”所以发生、发展的 原因及其时代背景

在两汉大一统的局面下,在轮廓和现在差不多的辽阔的版图上,在三百年相对稳定的长时间内^⑤,随着经济力量的高涨,与军事力量的扩张,学术沿着它本身的发展规律,在统治者的政治力量的推动下,亦在蓬勃发展。京师太学的生徒以万数。地方则私家开门授徒,负笈从师者不远千里,门生著

录成千上万者,比比皆是。不但儒学广泛流传,分支愈细。其他附属于儒学的阴阳术数之学,亦同样有所发展。学者欲出人头地,仅仅是通晓五经还不够,必须“博览古今,兼明图纬”,或风星(风,风角。星,星算)不可。其尤杰出者,则政术、兵谋,亦在通晓之列。而“谈论”则是他们的一种口头发表方式,所谓“不言谁能知之”。而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,能言矣,还得讲究言的艺术。这大概就是“谈论”被指责为“习浅浅之辞”,及被戴上一顶“浮华”帽子的由来。

东汉王朝从和帝(89—105)到王朝结束(219),一共是九代。其中三代是婴儿或幼童为帝,每代只有一年,可以不算^⑩。末代的献帝(190—220)是傀儡,也可以不算,实际是五代^⑪。而这五代,也差不多都是短命的皇帝。其中最多的才活到三十六岁,少的二十七岁就死。这对他们的皇后来讲,既是可悲,又是可喜。皇帝死得早,太子当然年纪小(如果不是太小,事前还可捏造题目,废长立幼。如果绝了后,那就更好办,选一个年幼的嗣君,好让自己长期抓权),她们就可以“得意”地登上太后的宝座,临朝听政。而太后临朝,必然是内靠宦官,外靠外戚。太前一死,或小皇帝长大,又必然是靠平素和他亲近的太监把专权的娘舅除掉。这样几个循环往复,宦官的权势愈来愈膨胀。而靠太后牌头的外戚,则好比凌霄花,不管他怎样枝叶繁茂,所寄生的乔木一倒,就必然归于消灭。东汉王朝,在他们的拉锯式折磨下,便不可避免地逐步滑向下坡路。

东汉外戚中最坏的一个是梁冀。他是梁太后之兄,靠其两妹之权宠(一是梁太后,一是桓帝的梁皇后),跨顺帝、桓帝两朝,专权近二十年之久,贪横不法,作恶多端。可是搞掉他

的那一小撮太监就更为凶恶。他们人数多,不但本身作恶,而且“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”,搜括百姓,“虐遍天下,民不堪命,起为盗贼”^⑩。这已到了桓帝在位的后半截时期。桓帝是个荒唐鬼,他三娶皇后,后宫宫女有五六千人,可是他最后还是绝了后代。他的承嗣子灵帝,就更妙了。他的老子好色成狂,他却爱财若命,挖空心思,大置其皇帝私产。凡属新官上任,都得按其品级,缴纳一笔买官钱,多的达数千万。这些钱最后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取偿。这两位宝贝皇帝,除了满足其卑劣的欲望和特殊的嗜好外,其他一切,几乎任凭太监们胡作非为。在桓帝时期,太监们的代表是“五侯”。灵帝则把这数字翻了一翻,成为“十常侍”。还公然叫嚷:“张常侍(让)是我父,赵常侍(忠)是我母。”他的确很天真,说出了心里话。其实东汉从和帝起,那些脆弱的纨绔皇帝,谁不是这样想呢?

这一长达百年之久,使广大人民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恶劣政治形势,不可能不给“谈论”涂上时代的色彩。随着时代背景的不断变迁,“谈论”(“论议”)的内容在其影响下,不可能不有所反映、有所变化。

四、“谈论”的三个阶段

“谈论”(“论议”)的时限,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

第一阶段是和帝、安帝、顺帝时期(89—146);

第二阶段是桓帝、灵帝时期(147—189);

第三阶段是献帝及魏、蜀、吴时期(190—280)。

- ① 《晋书》卷九八《桓温传》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不任其责。”
- ② 《蜀志》卷一《刘焉传》注引。
- ③ 《蜀志》卷十五《杨戏传·季汉辅臣赞》注引。
- ④ 《吴志》卷七《步骖传》注引。
- ⑤ 《魏志》卷十《荀彧传》注引。
- ⑥ 《前汉书》卷八八《儒林传》注引。
- ⑦ 《后汉书》卷五五《鲁丕传》注引。
- ⑧ 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九下《儒林传》：“若乃经生所处（注：经生谓博士也），不远百里之路。精庐暂建，赢粮动有千百。其耆名高义，开门授徒者，编牒不下万人。”由此可见各地区儒生之多。有儒生的地方，即有论难。
- ⑨ “难者必明其据，说者务明其义”。驳斥对方，一定要提出根据。申说己见，一定要讲清道理。这是给“论难”下的定义。
- ⑩ 鲁丕这道奏章，上于和帝永元十一年（99）。
- ⑪ 注：“墨绶，令长之属也。”
- ⑫ ⑬ 《魏志》卷一《孔融传》注引。
- ⑭ 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九上《儒林列传》，又卷七八《翟酺传》。
- ⑮ 新莽之末，从新市平林兵起到公孙述败死（23—36），不过十四年，中国复归一统。
- ⑯ 殇帝（106），冲帝（145），质帝（146）。
- ⑰ 和帝（89—105），安帝（107—125），顺帝（126—144），桓帝（147—167），灵帝（168—189）。
- ⑱ 见《后汉书》卷一〇八《单超传》。

第一章 “谈论”的第一阶段—— 和、安、顺时期

第一阶段和、安、顺时期有关“谈论”(“论议”)内容的记录,被保留下来的不多,或者是一鳞半爪,不很具体的。

1. 杜安

《先贤行状》:

杜安……十三入太学,号曰神童,既名知人,清高绝俗^①。

按,安子杜根于安帝永初元年举孝廉^②,安应是章和时人。

2. 法真

《三辅决录注》:

法真年未弱冠,父在南郡,步往候父。……正旦,……朝……会者数百人。真于窗中窥其与父语,……曰:曹掾胡广,有公辅之量。……世以服真之知人^③。

3. 荀淑

《后汉书》卷九二《荀淑传》:

字秀和,颍川颍阴人也。……少有高行,博学而不好章句,多为俗儒所非,而州里称其知人。安帝时,征拜郎中。

《续汉书》:

淑有高才,王畅、李膺,皆以为师^④。

张璠《汉纪》:

淑博学有高行,与李固、李膺同志友善。拔李昭于小吏,友黄叔度于幼童。以贤良方正征,对策讥切梁氏,出补朗陵侯相^⑤。

《先贤行状》:

……所拔韦褐刍牧之中,执案刀笔之吏,皆为英彦^⑥。

4. 钟皓

《后汉书》卷九:

《钟皓传》:字秀明,颍川长社人也。以诗律教授,门徒千余人。……时皓及荀淑,并为士大夫所归慕。李膺常叹曰:荀君清识难尚,钟君至德可师。

5. 黄宪

《后汉书》卷八三《黄宪传》:

字叔度,汝南慎阳人也。世贫贱,父为牛医。颍川荀淑至慎阳,遇宪于逆旅,时年十四。淑竦然异之,揖与语,移日不能去,谓宪曰:子吾之师表也。既而前至袁闾所,未及劳问,逆曰:子国有颜子,宁识之乎?闾曰:见吾叔度邪!

同郡陈蕃、周举尝相谓曰:时月之间,不见黄生,则鄙吝之萌,复存乎心。

郭林宗少游汝南,先过袁闾,不宿而退,进往从宪,累日方还。或以问林宗,林宗曰:奉高之器,譬诸汎滥,虽清而易挹。叔度汪汪若千顷陂,澄之不清,挠之不浊,不